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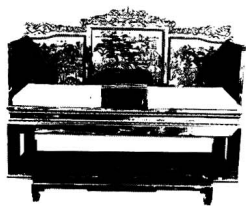
◎ 王海燕 著

帝国的象征：

清东陵的政治——社会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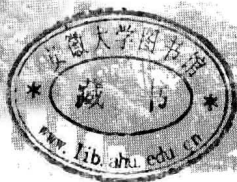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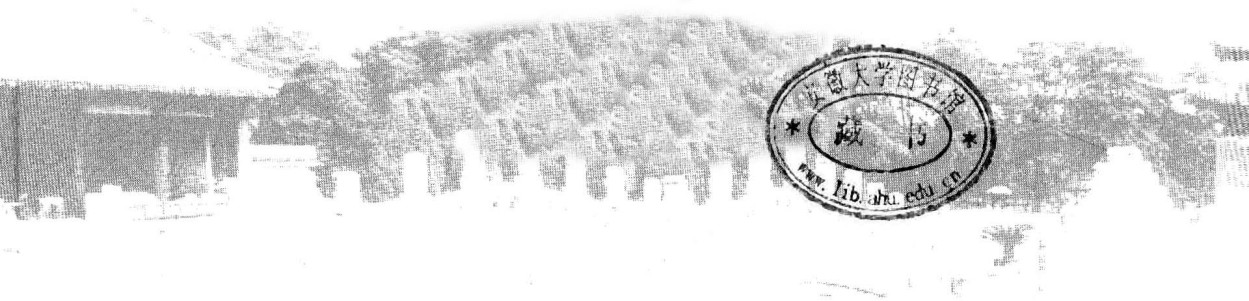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帝国的象征：

清东陵的政治——社会史研究

◎ 王海燕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象征：清东陵的政治—社会史研究/王海燕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668 - 0445 - 7

I. ①帝… II. ①王… III. ①陵墓—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K928.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728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7

字 数：320 千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从“地方”到“整体”——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	(1)
第二节 研究价值	(7)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9)
第四节 资料来源、思路和撰写方法	(22)
第一章 清代陵寝制度和清东陵	(26)
第一节 清之前陵寝制度概述	(26)
第二节 清代陵寝制度	(29)
第三节 清东陵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76)
第二章 陵寝工程	(85)
第一节 陵工前奏	(85)
第二节 陵工匠役、用料及其银两耗费	(100)
第三节 陵工事件	(114)
第四节 从陵寝的营建和维修看清王朝的时代盛衰	(120)
第三章 护陵：制度与纠纷（一）	(126)
第一节 清东陵的管理	(126)
第二节 陵区学校和员役兵丁的娱乐生活	(148)
第三节 陵寝工程中的赔修制：以裕陵隆恩殿为例	(175)
第四节 陵园禁令及其严密的防护	(180)
第四章 护陵：制度与纠纷（二）	(200)
第一节 对官兵兵弁的奖惩	(200)
第二节 四品郎中庆玉的侵盗及僭越案	(207)
第三节 民人为生计铤而走险——发生在清东陵的各类刑事案件	(217)

第五章 谒陵之行	(224)
第一节 谒陵路线、随扈人员及应用物资.....	(224)
第二节 谒陵驻跸之所——行宫的修建与维护.....	(227)
第三节 谒陵途中发生的事件.....	(234)
第四节 蠲免钱粮——对所经州县的恩惠.....	(241)
第五节 从谒陵之行看康、乾二帝的为政风格.....	(244)
 第六章 维系大清江山绵延不绝的帝国象征	(253)
第一节 清东陵的风水象征.....	(254)
第二节 清东陵的宗法秩序象征.....	(256)
第三节 清东陵的仪式象征.....	(257)
第四节 清帝国永恒的象征.....	(259)
 参考文献	(262)

绪 论

第一节 从“地方”到“整体”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

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作为一种颠覆“传统史学”的“新范式”史学,发展到现在,不仅在与它相对立的或者有分歧的派别争论中,同时也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修正其理论和方法,一步步走向成熟。在社会史“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其羽翼渐丰”^①的今天,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澄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史”能否研究或更确切地说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

对前者的回答应该说不难,因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史”或“生活方式史”或“社会行为史”,而且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即是一种“新范式”。^②既然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研究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制度和现象呢?虽然作为新范式的社会史是以与传统的政治史学的对立面这种方式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不要政治史,只是要改造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在方法手段上试图探索一种新的途径,变单纯的叙事和笼统的概括历史为细致而深刻的解释历史,以求史学研究接近真实。

至于社会史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这也是无须多费口舌辩驳的问题。因为这绝不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注重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活动,而社会史学者则钟情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社会史和政治史在所

①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2页。

②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见《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39~440页。

关注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鸿沟”^①。很显然这是对社会史的最大误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然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②。有的学者更明确地提出，“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③。即便是早期的年鉴学派，也从来没有“摒弃政治史，只是反对历史以政治史为主体，所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中说年鉴学派的著作，‘国家就连经济都包括在一种内容广泛的社会思考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因素遭到了忽视’”^④。

然而对后者的回答，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既然社会史可以而且有能力研究政治史，那么，怎样去研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介入？换句话说，如何去发现、研究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联系问题以及怎样找到它们的结合点？这些问题在目前看来，还处在探索之中。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史介入政治史较为成功的研究范例，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⑤、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⑥以及王笛的《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⑦等，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大家认同的明晰的思路可供研究者参照。这需要政治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的共同努力。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将晚清至民国国家力量不断扩展的过程，放置于华北区域社会的情境中去加以阐述的；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亦是从江浙地区的巫术骚动以及朝廷

① 王笛：《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见孙江主编：《新社会史：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王笛在此文中介绍了史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即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上述差别。

② 王笛：《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见孙江主编：《新社会史：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③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页。

④ 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见周积明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⑤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 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⑦ 王笛：《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见孙江主编：《新社会史：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讲起，进而讨论帝国官僚体制的运行，从地方事件中窥见国家政治；王笛的《街头政治——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政治文化》同样也是以对20世纪初的成都街头政治的考察而揭示政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上述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是，他们都将国家政治放在一个区域社会里考察，都是首先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切入，进而扩展到国家“跨区域”的宏观政治，即自下而上地去解读国家政治。尽管他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如对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关注不够），但他们的尝试已经是很了不起，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了。因为这样一种方法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填充式”或“标签式”，只着眼于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而忽视了政治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地方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即解构了传统的政治史。所以，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史，这种“新型的政治史在政治史的范畴内不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政权的历史，不再关注那些大人物，诸如国王和大臣是谁，而是探讨解释政权在何处，拥有权力的是谁，社会的权力在哪里”^①。也就是说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特别注重挖掘历史事件（或叫历史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次的东西。虽然这些历史事件有可能仅仅发生在一个小范围或一个区域里，但它的背后却可以牵出整个帝国的制度，从而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制度提供帮助。

有的学者虽承认“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贡献很大，但也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虽然承认“‘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同时却担心地方史“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②。一言以蔽之，他们就是认为社会史难以完成学科整合的历史使命。^③很显然，这些担心的本质就是否定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历史视角的观点，仍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自然也就由此推论出社会史是没有能力解读政治史的。首先，我们仍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是观察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不论是地方史还是跨地域的整体史，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社会史是有能力驾驭跨地区的宏观政治的，其中最基本的理由之一，就是地方视野里的政治史研究，有些选

① 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6页。

②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12页。

③ 冯尔康：《“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第167页。

题本身就是解读跨地域的国家政治的总体演变轨迹。如上述提到的杜赞奇、孔飞力和王笛的三部论著，他们虽然是以区域为切入点，但最终讲的还是国家的宏观政治。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其成功之处也正在于他们有别于传统思路的社会史视角。其次，从社会史对政治史研究的实际操作要求看，这种担心更是没有必要。从地方社会去解读整个国家的宏观政治，确实是从各自地方历史场景出发，通过对地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考察国家的宏观政治在这个地方的实施以及演变情况。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历来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国家的宏观政治，包括法律法规、各种措施和制度等在各个地方的贯彻执行不可能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在国家政治强烈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近代，国家政治在各地的实施也不可能“刚”性到一成不变的程度，它总会根据各地的实际状况作出某些适当的调整。近些年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①从地方史的视角去解读政治史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就可以把国家的整体政治在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施状况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进而揭示国家宏观政治的总体发展脉络。既“立足于地方”，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地方”，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相比之下，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这种微观细致的考察，在脱离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的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的填充式研究，由于“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其结果很难避免出现千篇一律、僵化呆板和“机械教条的图解”的缺憾局面，以至于造成“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②。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恰恰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把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一个区域（或叫地方）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通过“地方”这一视野，不但能够使我们窥探到整体政治史这张地图，而且所看到的这张整体史的地图较之从前更加多姿多彩和真实可靠。至于怎样拾掇起碎片去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政治史的图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失的出现，这里需要的是综合的研究和理论的提升问题，这也正是需要史学工作者们今后为之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

诚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上述学者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哪个学科，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提出和实践，总会伴随着挫折、迷

①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7页。

②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页。

茫、困惑，甚至是缺憾。地方史解读政治史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创新的努力。任何事物，如果不去探索尝试，怎么会知道它的好与不好呢？在历史学研究面临困境的今天，创新意识尤显重要，墨守成规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模式上，不但不会给历史学带来繁荣，很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但我们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进行区域史研究时，必须时刻保持区域的开放性，同时结合政治史的整体视角，综合使用区域史和整体史的路径。”^①就地方史能否解读政治史和如何解读政治史这个问题而言，既然它是个有趣和有价值的课题，那就需要史学工作者们树立信心，投入更大的精力去研究，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地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地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作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其《社会史向何处去？》中所讲到的：“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②由“微观”到“宏观”、由“地方”到“整体”，这种从区域社会的视角切入去考察国家的宏观政治的研究方法，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传统方法那种大而粗、笼统而宏观的弊端，即通过对地方社会历史的考察，去管窥国家政治的演变，从而使政治史的研究更趋缜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总之，“运用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对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精英人物、国家制度和权力运作等现象进行再研究，能够为政治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创新政治史研究途径”。在研究方式上，“可以突破

^① 李忠人：《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见《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两篇），《新华文摘》2012年第12期，第65页。

^②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5页。

‘区域—整体’、‘微观—宏观’和‘上层—下层’的割裂性限制，以利于建立全面、立体和动态式的政治史研究架构”^①。

尽管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但并不是说它的一切都是失败的，应该承认其在某些问题上仍有所长，如王朝的更替、帝王将相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等。也就是说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并不是完全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是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取其之长，去其缺欠。尤其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对某些问题，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政治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渗透给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地方社会又是如何应对国家政治的？这些不应该仅仅是社会史学者或者是政治史学者独自要去解答的，而是需要二者通力合作，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摒弃社会史和政治史“二元对立”的观念，建立起二者沟通和对话的平台，探索出一条双方联系的有益途径，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使政治史的研究真正走出一条新的路径。

回顾近些年对社会史的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那些与国家政治相对抗的一些很显眼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②。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社会史学者应该认真地反思，应该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完善。其实，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用之初，因为处在探索阶段，所以有缺欠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只要社会史学者始终具有反思和不断追求完善的意识，就能够少走弯路，使新的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在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澄清和强调的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政治史，并不是说把眼光只盯在地方社会中那些对抗国家政治的力量，同时也会关注到地方社会中那些情愿或不情愿地在国家政治的规范下生活的人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行动，去服从国家的政治？社会史学者对此同样感兴趣。总之，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史，在对待政治史的研究上，同样不会局限自己的视野，圈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犯自束手脚、“画地为牢”的错误。

另外，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片面地理解“地方”和“整体”这

^① 李忠人：《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见《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两篇），《新华文摘》2012年第12期，第65页。

^②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12页。

两个概念，把二者对立起来。虽然说作为微观的“地方”研究，往往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所选择的“点”很小，但是它的方法仍然是整体性的。赵世瑜在其《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一文中所讲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把整体史追求与更为微观的地方性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也是对整体史的误解，因为整体史不一定单纯地意指布罗代尔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史，因为拉迪里的《蒙塔尤》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整体史的杰作，同时区域史意义上的整体史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普遍性。”^①从“地方”中可以见到“整体”，而“整体”中一定是包括“地方”，“整体”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地方”的视野，才导致它对事件解释的苍白无力。最终使“‘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为边缘学科”^②。“社会史”作为新兴学科之一，能够“吞噬”和“肢解”“政治史”，说明“社会史”本身具有“政治史”不具备的优势。由此可见，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同样也体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无论如何，从“地方”到“整体”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将会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社会史视角的政治史研究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块园地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齐心协力进行耕耘。

本书即尝试用上述方法，一方面，研究清东陵的修建和维护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另一方面，从地方社会的视角、在区域社会的场景下，自下而上地探索国家宏观政治的演变，即清王朝通过修建皇陵这样一个具体的大事件，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是如何展演国家政治的，进而揭示陵寝制度在清王朝的历史中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以及如何扮演的问题。

第二节 研究价值

为什么要选择清东陵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其一，笔者比较熟悉这个地方。笔者曾经在唐山工作了八年，所教过的学生中，有很多就在陵区居住，甚至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就是守陵人的后代，笔者也曾亲自带着学生作为专业考察去过几次清东陵。应该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其二，笔者曾经作过冀东社会的课题研究，尽管涉及清东陵的不多，但毕竟还是接触了一些地方资料，对完成此研究是有帮助的。其三，这是笔者选择清东陵作为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的一点。

^①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4页。

^②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页。

清东陵是清代入关之后所建造的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的陵园，这里所葬的多是清代或者说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人物。若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作为皇家陵寝所在的地方社会，肯定是有别于其他区域社会的。比如说国家政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社会里是如何“展演”的？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状况、生态环境、文化风俗以及百姓的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否都会因皇陵的修建而受到影响？这一特殊的区域社会较之一般的地方社会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是有讨论价值的。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本书讨论的重点还不是专讲区域史的问题，而是通过清东陵（从空间范围上可以说是一个区域，从时间延续上可以说是一个断代）的研究，阐释清王朝的政治制度，进而在方法论上实践和证明用社会史这一新范式研究政治史的可操作性。具体地说，即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的眼光，通过清东陵这样一个微观具体的特殊区域，去解读清帝国的宏观政治，由此去解构传统的政治史。

到目前为止，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有关皇家陵园区域的还鲜有涉及，中国有着 2000 年的陵寝制度史，从战国到明清，建有多处皇家陵园，由于统治者奉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所以历代陵寝几乎都是按照帝王生前所居的宫廷格局设计建造而成。这些规模宏大的陵园从一开始筹建，就要和所在地方社会发生关系，迨到工程竣工及帝后妃们的奉安、拜谒祭祀等，都会给所在地方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以陵寝为中心、辐射周围地方的一个独特的区域社会。那么，这样一个独特的区域社会内部是如何运作的？所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种历史画面？这种地方社会的政治和国家的宏观政治是怎样的关系？这不但是有趣味，同时亦是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有清一代，共建有 5 处帝后陵寝：即入关前的盛京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的永陵（清代远祖，即肇、兴、景、显四祖）以及入关后的河北省遵化市的清东陵和河北省易县的清西陵。在这些陵寝中，清东陵的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清朝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一样，非常重视皇陵的营建，几乎每一个新皇帝继位伊始，就着手为自己相度“万年吉地”，陵址一旦选定，便不惜耗费巨资，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兴修。清东陵自康熙二年（1663）首建孝陵起，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修慈禧陵竣工，修陵时间历时近两个半世纪，前后共修建了 15 座帝后妃陵寝。其中帝陵 5 座、皇后陵 4 座、妃园寝 5 座、公主园寝 1 座，大小单体建筑达 580 座，其神道总长 14 500 米。这些陵寝都是依昌瑞山南麓按主次分布。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的孝陵居中，左为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康熙帝的景陵，右为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的裕陵，再左为清朝最短命的同治帝的惠陵，再右是继位后历经风波最多的咸丰帝的定陵。这 5 座主要陵寝中间还分布着皇后陵和妃园

寝，慈禧以及极具传奇色彩的香妃的陵园寝也在其中。而在陵区外围还分布着众多的王爷、太子、公主、大臣的坟墓。在陵区大红门外还矗立着清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政治家、曾辅佐儿孙两代的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在清东陵共埋葬了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1位阿哥，总计157人。为了守护这些陵寝，清政府在此设立了一套庞大的组织系统，供职的官兵役员人数多达6357人。另外，帝后奉安、谒陵以及每年大小祭祀活动等所需物品中的一部分，即由附近州县民人提供。这样一来，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域社会网络关系。研究这种独特的区域社会，对于了解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宏观历史都是十分有益的。总之，清东陵虽然是一个微观的区域，但它的历史几乎与清王朝的兴亡相始终。作为皇家陵园，从建陵（包括选址、供料、雇用役夫）、护陵到谒陵，这一系列的活动过程，可以说均牵涉到了清帝国诸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对清东陵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清王朝的历史。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各地区的差异性很大。区域社会史学就是要揭示各个区域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走出传统史学那种在“宏大叙事的结构”^①下抽象教条研究的怪圈，使历史学研究更加走近真实。那么，清东陵作为一个区域（包括陵寝本身和周边社会，即风水墙内外），自然也是中国众多区域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它是一个皇家陵寝所在的特殊区域。从这个角度说，它应该有更多既有趣又有价值的东西可供讨论。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一、陵寝制度史研究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包括陵墓及其附属建筑，合称为陵寝。我国从第一个王朝夏到最后一个王朝清，历时三千余年，其间，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共有帝王五百余人。至今地面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共有一百多座，分布在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区。所以我国的帝王陵寝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布局严谨、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陵寝及陵寝制度史的研究，应该是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因为它涉及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美

^① 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载《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6页。

学、哲学、景观学、丧葬祭祀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有关陵寝制度史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历代记载陵墓的书很少。较早的有魏文帝时期由王象、缪袭所撰《皇览》一书。“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①此书有800余万字之多，“所以，后来有人怀疑皇览并非仅记冢墓之书。清人侯康曰：‘冢墓盖即四十余部中之一。’又沈家本曰：‘索引但云：记先代冢墓，似皇览专记此一事，其说非也。’”^②这部大作随着时代的变迁，基本散失殆尽。今天只能从御览礼仪部及《水经注》得见原文三十余条。^③

明朝出现了两部有关陵寝的著作，一为《历代山陵考》，可能由兵部尚书王在晋编撰。另一为王在晋撰《国朝山陵考》。前者内容简单，但书中记述了历代陵寝的发展演变状况。两书对后世研究陵寝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朝康、雍时期由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亦将很多朝代的陵寝收录于书，是研究陵寝者不可忽视的资料。

清道光年间，朱孔阳根据古籍文献，包括正史、地方志和诗文编撰的《历代陵寝备考》（光绪年间铅印本，上海申报馆）一书共五十卷，搜集资料较为全面，是值得重视的。

徐干学的《读礼通考》（清光绪七年刻本，江苏书局），是一部历代丧葬制度的资料汇编，书中有辑录历代山陵制度的内容。但此书多侧重礼制，资料不够完善。

清人长润等纂修的《陵寝规制》，对陵寝建筑的规划和设计作了专门的介绍。

清佚名撰《明陵纪事》（清乌丝栏钞本），专就北京昌平天寿山十三陵各陵之规制和管理防护等作了详细的记述，同时书中记有清初统治者对明陵的保护，如每陵设司香太监两名，香火地若干亩，每陵派军三名，每名给地三十五亩，顺治四年（1647）四月，命工部修明陵；顺治九年（1652），禁樵采等。清朝入关后对前明陵寝的保护，多被誉为“清朝的一项德政”^④。的确，通过清朝统治者这一明智的措施，使宏伟壮丽的十三陵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当然这一举动背后深层的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笼络人心，为其稳定统治服务。

清人潘时彤的《昭烈忠武陵庙制》、佚名撰《皇清陵寝风水纪略》、董恂的

① [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8页。

② 谢敏聪：《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台北：中正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③ 谢敏聪：《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台北：中正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④ 谢敏聪：《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台北：中正书局1987年版，第9页。

《永宁祇谒笔记》和《凤台祇谒笔记》、布兰泰撰《昌瑞山万年统志》等，均是研究陵寝制度史不可不参考的书籍。

除此之外，在某些正史的“礼制”、“纪”、“传”；各代会要；历代各陵寝所在地文献以及古代礼仪制度中也有关于陵寝的记载。

20 世纪初，刘仁甫编《前明十三陵始末图说》（编者自刊，1915 年），记述了明十三陵修陵的经过、各陵主人与陪葬人的生平事迹，书后还附有各陵的诗文、题词、楹联等。

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较为系统和有一定影响的是杨宽所著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任常泰所著《中国陵寝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杨哲文所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台北明文书局，1987 年）、谢敏聪所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台北正中书局，1997 年）和王其亨主编的《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年）。杨宽所著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作者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学用的学术报告，主题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中编是关于古代陵寝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如先秦墓建筑的问题、“墓祭”的起源和发生时代以及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又论及了祠堂、石祠、华表、墓碑等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等问题。下编是作者到西安、洛阳等实地考察后所写的四篇文章。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凡涉及中国陵寝制度内容的，首先会提到杨宽的这部著作，其影响可见一斑。确实，该著的最大特点在于对有关陵寝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所作的细致考证。因此，该书自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尤其对于从事陵寝制度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但该书主要是对唐代以前的陵寝制度进行了论述，唐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陵寝制度涉及很少，显得有些头重脚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任常泰的《中国陵寝史》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全书共分七章，从先秦传说时代的黄帝、尧、舜、禹陵开始，一直讲到清代帝陵，内容十分详尽，所引史料广博。杨哲文的《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和谢敏聪的《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二书均是通史性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皇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尤其谢书以二十一章的篇幅，按朝代顺序系统地阐释了各代陵寝概况，并配有大量的附图加以说明。

另外，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出现了一些论文集和专著，如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皇宫陵寝》（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帝王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2 年）、罗哲文和罗阳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 年）、孙中家、林黎明编著《中国历代陵寝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和《中国帝王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王德恒的《北京的皇陵与王坟》（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年）、黄景

略、叶学明所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罗哲文所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墓》（外文出版社，1993年）、胡汉生的《明十三陵大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张文生著《中国皇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曹蕾编《北京皇陵》（外文出版社，1997年）、曹砚农著《古代帝王陵寝实录》（岳麓书社，1997年）等。在上述各书中，以前两部论文集最为重要，因二者均以清代陵寝为收集对象，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应该说代表了近些年国内关于清代皇陵研究的总体面貌和水平，这些学者也应该说是目前国内从事陵寝制度尤其是清代陵寝制度研究队伍的主力军。所以这两部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深入程度还不够，其中有些文章，其论述不够严谨、技术不够规范，甚至某些观点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刘毅著《明代第五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五章的篇幅，通过回顾，梳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和研究，对明代皇陵制度等进行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论述了明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明陵对清代和民国陵墓的影响，并对明清两代陵寝制度的异同作了比较。就陵寝断代史而言这应该是近年来较为系统且有一定深度的一部著作。但其研究方法仍然是传统的。

1995至1998年，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关外陵寝：城阙”系列书籍，包括李凤民主编的《兴京永陵》和《沈阳辉山》；李凤民、陆海英编著的《沈阳福陵》等著作，对清代关外各陵的建造历史及其风格特点予以阐释，为全面了解和把握整个清王朝的陵寝制度提供了帮助。但这些书还是过于简单。

21世纪之初，又有一些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刘庆柱、李毓芳所著《陵寝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和孙翠玲、冬熊编著《陵寝下的神秘：中国名墓大观》（昆仑出版社，2000年），以考古发现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帝王陵寝发展的历史。苏宝敦著《北京皇陵集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围绕位于北京的金皇陵、明十三陵、清东西陵及朝代的历史背景作了概要的介绍。宋大川等著《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通过对北京房山金陵陵区遗址的考古调查，在介绍山陵和宗庙的同时，论述了金代的丧葬制度。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书籍，因为此书的论述是建立在考古调查基础之上的，所引资料比较有说服力，可以说是研究金代陵寝的上作。胡汉生所著《明十三陵探秘160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解答了明十三陵陵址卜选、营建、建筑规制与沿革等诸多问题。王伯扬主编的《帝王陵寝建筑：地下宫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主要从建筑学的视角，以图、文的形式论述了帝王陵寝建筑的发展沿革和建筑特色。陆建松的博士论文《明代丧葬文化考》（复旦大学，2000年，由樊树志教授指导）重点虽为明代的丧葬文化，但其中陵